

風展紅旗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革命回忆录丛刊 ·

风展红旗

第 六 辑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风展红旗

(第六辑)

本社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6.12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书号: 11173·142

定价: 1.30元

目 录

周总理和福建人民心连心·····	童小鹏 (1)
李先念同志一九四六年三月来信·····	钟大湖 (9)
在金沙江畔·····	杜 明 (14)
“有了根据地就有了家”·····	许军成 (22)

——忆刘少奇同志在皖中的一次讲话

将军泪·····	赵清学 (27)
“我愿做一个长工·····”·····	陈茂辉 (30)

——怀念张鼎丞同志

忆郭滴人在连江的革命活动·····	郑厚康 (41)
-------------------	------------

莫斯科中山大学琐忆·····	谢怀丹 (49)
《汀雷》一声疾而洪·····	胡軼环 (90)
在上海秘密印刷厂的日子里·····	林一心 (94)

结盟·····	饶守坤 (107)
新四军三支队改编前后侧记·····	孙克骥 (118)
跟白求恩学医·····	张 斌 (127)
潜行四千里·····	王华生 (135)

——护送方方同志赴南方局

福建斗争回顾.....	胡允恭 (143)
营救、接待美国飞行员.....	朱 勇 (168)
转战闽北三年间.....	黄垂明 (174)
徐东阻击战.....	王培臣 (184)

——淮海战役回忆

周总理和福建人民心连心

童 小 鹏

今年一月八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周总理,离开我们十年了,可是他一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一贯勤奋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严于律己、善于团结群众的高贵品德,将永远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的心中。

我是福建人民的儿子,长期在外地工作,这次回到家乡来学习“山海经”,正逢恩来同志忌辰,缅怀先贤,思绪万千,不免想起他生前在领导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同福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直接关系的许多事情来。现根据回忆和手头资料作简单回顾,愿同八闽人民一起学习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贵品德,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把福建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搞得更快更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上都取得重大成果,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

周恩来同志是最早关心福建党组织建设的领导人之一。在第

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他于一九二四年秋由法国回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当时他对闽南、闽西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就很关心，曾派黄埔学生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回闽建立党团组织和搞群众运动。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等破坏国共合作，疯狂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恩来同志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根据党中央决定于八月一日在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九月，起义军由江西进入长汀、上杭、永定等县，沿途宣传党的政策，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恩来同志在上杭接见了各县党的负责人，号召举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为闽西党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恩来同志由上海经过他亲自领导布置的从上海、广东到福建的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曾输送了数以百计的领导同志和干部进入中央苏区，从未遭到破坏）进到中央苏区。他在赴长汀（当时叫汀州）途中，了解到闽西党组织在处理“社会民主党”问题上所犯的扩大化错误并造成了严重后果后，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制止，对纠正当时肃反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挽救了不少好干部。他到达长汀时，即参加闽粤赣省委会议，报告国际国内形势和战斗策略。他到达江西瑞金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中央苏区党政军工作，使赣南、闽西的根据地和红军日益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二年三月，红军因攻赣州未遂撤退后，苏区中央局决定将红军分成东路军（第一、第五军团）和西路军（第三军团）向赣江东西两面发展，接着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东路军远出闽西打漳州，以达到调动和消灭敌人，发展革命形势，扩充兵源和补充经费给养等目的，并派毛泽东随东路军行动，加强领导。周恩来同志亲自到长汀和福建省委共同研究动员白区地下

党和闽西群众支援红军，搬运战利品和物资回苏区等问题。四月十日，东路军攻占龙岩，二十日，攻占漳州，把国民党四十九师张贞部大部消灭，俘敌二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飞机两架和大量军用物资，筹款近百万元，并扩大了红军。这一胜利，对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巩固和发展闽西南的根据地和武装斗争，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当时在一军团政治部工作，曾随军入漳州，和同志们一起欢呼这一重大胜利。当年十月，恩来同志与朱德一道指挥红军攻占了建宁、泰宁、邵武、光泽等城，开创了闽西北革命根据地，并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打成一片。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他又一次亲到建宁前线指挥，并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留影纪念。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的影响下，国民党抗日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不准抗日的蒋介石破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要求抗日。在此之前的九月，他们就曾秘密派出代表吴明到红军驻地来商谈共同抗日反蒋的斗争，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同志力主与他们联合，亲自和蒋、蔡的代表谈话，先后派了潘汉年、黄火青等同志为代表赴福州进行联络工作，并在十月间与他们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形势是很好的，如果真诚合作下去，不仅可以粉碎蒋介石对红军和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且可以联合十九路军打到浙江、江苏，开创反日反蒋的大好局面，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可是由于当时临时党中央为王明“左”倾错误所统治，根本否定国民党内部有抗日力量，把蒋、蔡等当成“最危险的敌人”，不同他们真正联合。在蒋介石从江西抽调兵力去福

建镇压十九路军时，又不接受毛泽东等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并打到浙江去的正确主张，结果“福建事变”宣告失败，蒋介石又集中兵力进攻红军。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第五次“围剿”没有被粉碎，红军不得不仓猝走上长征道路。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会议后，他和王稼祥一起协助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在四川西部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领导红一方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二

抗日战争时期，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和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他先后领导中央长江局（设在武汉）、南方局（设在重庆）的工作，对发展和巩固南方各省和西南的地下党组织，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恩来同志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就到西安同蒋介石谈判，他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接着他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武汉等地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谈判。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协议，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将红军主力长征后坚持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广东八省范围内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福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第二、第三支队，在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粟裕、叶飞等同

志的领导下，北上集中到安徽参加抗战，保存与发展了革命力量。在谈判过程中，曾发生闽南红三团何鸣部队集中在漳浦被国民党军队缴械的事件。周恩来同志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归还人枪，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张云逸同志也同时向广东余汉谋部交涉，使国民党不得不交还部分枪支。同时通知各地游击区提高警惕，以“何鸣事件”为教训，使各地游击部队顺利到达集中地。

周恩来同志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时，直接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的党的工作和斗争。对闽粤赣边党的工作，有过许多重要的指示；对福建其他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也十分关注；并通过各种关系对福建国民党当局陈仪等也进行了有效的统战工作。

三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福建的解放和剿匪斗争的胜利，也凝集着他的许多心血。

建国以后，作为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始终把巩固东南沿海海防和争取台湾归还祖国的斗争作为主要工作之一。当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取得胜利，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后，中央决定把主要军事力量转到东南沿海，以巩固海防。为此，立即派王震司令员率铁道兵及动员广大群众修建鹰厦铁路，这都是在周恩来同志与总参谋部及有关部门布置下进行的。如鹰厦铁路从大陆跨海连接厦门岛的线路选择，他除了亲自和铁道部门负责人同志及专家研究外，还各方面征求意见，现在经林跨海到集美进入厦门的线路，就是他根据陈嘉庚先生的建议反复研究各种情况后定案的。这条铁路的迅速通车，结束了福建没有

正式铁路（过去只有一条象征性的漳厦短小铁路）的历史。这对国防建设，对福建的经济发展都有重大作用，而且今后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同志们在和平环境中乘坐鹰厦铁路从福建到达祖国各地或看到从铁路运来的省外的粮食和物资时，是不会忘记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功绩的！

根据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把台湾的方针从武装解放逐步改为争取和平解放，最后发展到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经过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以“一国两制”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党的方针政策已日益为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所拥护。现在海峡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增多，祖国统一的前景越来越光明。在这方面，毛主席和恩来同志在世时，都付出了许多心血。一九七五年冬，恩来同志病重时，仍在医院召见罗青长同志，嘱托加紧进行对台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国人民的好总理不幸逝世，当几十万首都人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庄严的悼念后，邓大姐忍着悲痛亲自把恩来同志的骨灰捧送到大会堂台湾厅停放，准备举行追悼大会，以表示她和恩来同志对台湾人民的深切怀念。每当台湾同胞到台湾厅集会或会见负责同志时，他们想起此事，都会情不自禁地含着热泪表示对恩来同志和邓大姐这两位老革命家的无限崇敬和热爱！

一九六〇年初，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等“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和一部分部长在广东从化学习《政治经济学》，我也参加了这次学习。学习结束后，恩来同志特地批准我回到长汀童坊去了解家乡情况并接老母亲去北京。一到家，我就发现问题很严重，大食堂里很少粮食，乡亲们主要靠青菜充饥，还要饿着肚子去修公路；因“大炼钢铁”和烧大锅饭，竟把老祖宗种在后龙山上的

大松树都砍光了，群众有怨言又不敢公开说。但当地干部仍在当面说大话、空话、假话，说每人每月有三十斤谷子。我除向当地党委同志反映情况外，回北京后即向恩来同志报告，他特别重视，要我立即把情况报告省委，请省委采取措施解决群众粮食供应问题。奇怪的是，我回到北京不久，就听中央监委负责人钱瑛同志说，有人已向中央监委告了我的状，把我如实反映情况说成是“右倾”。

由于种种原因，福建每年都要从外省调入粮食，恩来同志对此十分关心，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一年两次庐山会议后，他都到南昌向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表示，感谢他们完成了向国家外调粮食的计划，并特别关照要首先保证福建军民的粮食供应。

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于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中反映，福建、安徽、山东、青海等省的干部对省委领导的意见比较多。少奇同志亲自参加了安徽小组的会议。恩来同志对福建的工作甚为重视，带我参加了福建小组的会议，每当他因参加中央会议不能到会时，就要我将会议情况向他汇报。他在会上号召到会同志根据中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和“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方针，不要顾虑，畅所欲言，并勉励同志们要有充分信心，暂时的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他特别强调福建是海防前线，一定要及时克服困难，争取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好转，才能巩固海防。会议开得很好，省委领导同志也做了自我批评，对改正领导错误，团结全省人民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福建的党组织和人民没有辜负党中央和恩来同志的希望，经过三年的团结奋斗，和兄弟省一样，克服了暂时的困难，完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集团及其爪牙对福建的破坏也是很严重的。他们在群众中和部队中挑拨离间，制造派性斗争，利用“造反派”把一大批老干部打成“走资派”，把长期在老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同志打成“叛徒”，把有海外、台湾关系的同志打成“特务”、“里通外国”等等。对此，恩来同志苦心孤诣，一方面在中央同林、江、陈等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干部，不让海防工作受到干扰，并召集福建省有关负责人到北京集中学习和一同制定解决福建问题的方案。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人民的好总理，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而鞠躬尽瘁，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当我们看到三中全会以来福建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欣欣向荣取得伟大成绩的时候，不能不引起对他的无限怀念和崇高敬意。让我们继承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和烈士们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告慰他们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三日于福州

（原载《福建日报》1986年1月7日）

李先念同志一九四六年三月来信

钟 大 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赢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但是，抗战胜利之后，美国为实现其反革命的全球战略，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并遏制苏联的影响，立即派遣大批飞机、军舰将国民党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华东各解放区前线，帮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并不断向解放区进犯，全力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战争，妄图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对日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又面临着内战的危险。

我们是在安徽贵池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那时，我任新四军沿江支队沿江团二营教导员，正带领二营五连和一支手枪队在安徽贵池、东流、至德一带开辟工作。八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团部命令：立即率队返回团部接受新的任务。当我赶到江北无为县团部时，沿江团大部队伍已经出发。团长周亚农简单地向我传达了上级决定，说是七师部队和地方干部都要撤往苏北，要我与湖东中心县委书记桂林栖同志留下来，就地坚持武装斗争。

当时，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有的同志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

尤其对国民党反动派重新挑起内战的危险，还不是都认识得很清楚，有的甚至怕再打内战。然而，面对国民党重兵包围我大别山根据地，不断袭击我军的现实，大家都深感局势十分严重。我接受了上级命令后就和桂林栖、张伟群等地方同志汇合，成立了皖西工委，建立了一支三百多人的皖西大队，积极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谋求生存。在极为艰苦的环境里，我们几乎天天打仗，牺牲了不少优秀干部、战士。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这支队伍仍然不断地发展壮大，到一九四六年春，队伍发展到一千余人，拖住了国民党广西军一个师和皖省的大量地方反动武装。由于队伍的壮大，根据上级指示，皖西大队改建为皖西支队，我为支队司令员，桂林栖为政委，转战于广大的大别山区。

我们这支队伍远离大部队，在战斗中又失去了电台，与上级的联系十分困难，而且当时形势错综复杂。“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注）对我们这支独立地坚持在大别山区作战的队伍来说，对国内形势发展缺乏全面了解，尤其队伍如何开展斗争，将来怎样发展等问题，大家都不很明确。在那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一方面，我们获悉了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紧接着又传来了国共两党正式公布停战令的消息；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我民主根据地的进攻仍然有增无已，愈演愈烈，一场全面内战似已迫在眉睫。

为了及时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我们支队于一九四六年初派了刘健民同志前往湖北桐柏山地区，寻找新四军五师部队。三月底，刘健民同志回来，带回了中原军区司令员、五师师长李先念同志的亲笔信：

注：《毛泽东选集》，10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钟大夫（湖）
桂林栖 同志

刘健民同志到我师，略了解你们那里情况。

目前时局已和平，国民党内部一部分反动派以何应钦、白崇禧为首，企图利用反苏，破坏和平。因此，东北大战难免，以至华中特别我师很可能再重打内战。但无论如何，和平终究是要实现的。可是你们仍要严重提高警惕性。广西军仍是极其反动的，我们要运用和平大大扩大统一战线工作，使自己不致受到孤立。

我这里干部颇多，东北、华北需要大批干部，可是交通无着，决定从你处走一百以上之干部。他们现化装便衣，每人带手枪一支，到达你处后，如能集体通过，完全乘着夜间一下冲过去。若如此不稳时，可以化整为零通过，望多方加以协助。到达你区时，并由你指挥通过之。

我们现即需想了解皖省敌情之部署，特别是六安、合肥、舒城、桐城、庐江、安庆、无为究竟驻哪一些部队，敌之封锁设备如何，望能在短期送一情报给我们。我们要求刘健民同志再来报告一次。

闻你们财政困难，可是我军计六万多人，限制各狭小地区，财粮无着，目前正请示中央解决之。

致以

布礼！

李先念（印章）

三、二十

在这封来信里，李先念同志对我们急于了解的內战形势作了极其精辟的分析。他的分析充分体现了我党的战略总方针，即鉴

于国民党积极准备全面内战，我党在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上面，而明确规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同时，对我们部队所应采取的斗争策略作了明确的指示。

当时，李先念同志率领的中原解放军主力已由桐柏、唐河地区进至鄂皖边，原拟继续东进苏皖老解放区，与华中人民解放军会合。由于遭到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包围，被阻滞于宣化店、定远店、白雀园等地区。敌人对中原解放军主力和鄂东军区所控制的纵横仅百余里，人口约四十万的这一地区实行严密的封锁，人民生活，部队给养极为困难。李先念同志正领导军民在这极端险恶的环境里，艰苦奋战着。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如果局守一隅，不被敌人消灭，也会饥饿而死。为了生存，必须作战略转移。尽管在他给我们写信时，中央尚未对中国革命史上的这个转折点——中原突围作出正式决定，但是，他预见到了这一点。在来信中，他将了解皖省敌情的重任交托给我们，以便为中原解放军主力往后的战略行动，作必要的准备。后来的形势发展完全证实了李先念同志的预见性。

李先念同志率领中原解放军六万主力，把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牵制在中原地区，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而且，还决定直接派出大批干部支援东北、华北。李先念同志把接送这批干部的任务交付给我们，同时，对完成这项任务的具体办法等细节问题都作了详尽指示，由此足见其严谨的工作作风。

接到李先念同志的亲笔信，真使我们喜出望外，使我们对当时扑朔迷离、瞬息万变的形势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支队的斗争工作、发展前途等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来信极大地鼓舞了支队广大干部战士的战斗意志。